

# 泛论商战

武 曦

长期以来，商战被当作郑观应的特有思想，而忽视了对它的全面和综合的考察。本文除对“商战首先是郑观应提出的”说法提出异议外，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社会，商战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和强权政治的削弱、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，而形成、而演变、而完善。商战纯属晚清生产方式下的上层产物，赖于社会需要而存在，同传统思想、外来资本主义有着与共及内在的联系。虽然，它自19世纪60年代提及以后，几乎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时期，曾对政治、经济产生过一定影响，但其最终未能也不可能付诸实践。所以它只是近代中国早期商业资本思想的体现，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显示。

作者武 曦，1939年生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。

在近代，商战以曾国藩言及到黄炎培、庞淞的《中国商战失败史》出版为止，前后历50余年<sup>①</sup>。其间几经标榜，几经提倡，终而折戟沉沙，声逝寥寂。建国以后，商战成为史学研究对象，从60年代的“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”<sup>②</sup>，到80年代的“商战思想及其一整套经济主张，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”<sup>③</sup>，20年来，有关的研究不少，然较多的还是阐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，综述商战者则语焉不详。本文试图对商战作一较为广泛的考察。使它在总体上有更清晰的反映。

文化思想是人类按照物质生产发展而建立起相应社会关系所创造的，商战或为初期意识形态，或为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均植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基础。超经济地租、高利贷剥削与封建强权政治构成了社会主要生产关系；同时，西方金融资本，变为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，支配着象我国这样政治上独立的国家。因此，烙有时代印志的商战纯属晚清生产方式下的上层产物，赖于社会需要而存在，同传统思想、外来资本主义有着与共及内

在的关系。若论时,恐非郑成功其时其人已具有和付诸实施<sup>④</sup>;若论人,非某集团、某派别特有,更不是郑观应的匠心独运。

“‘商战’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的?”前两年有同志以此撰文质疑:一、郑观应论及商战不能算最早;二、曾国藩在1862年业已提出“商战”<sup>⑤</sup>。第一点纠正了陈陈相因“商战由郑观应首先提出来”的说法<sup>⑥</sup>,至于第二点文章引证曾国藩“复毛寄云中丞”和李璠奏折中“商鞅以耕战,秦西以商战”,认为曾国藩较早地提出“商战”口号。这似有探讨余地。

诚然,曾国藩曾较早地讲到“商战”,但它不是口号和后人所论的商战涵义。曾国藩说:

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,法制宽简,用能惠民安国。至秦用商鞅,以耕战二字为国,法令如毛,国祚不永。今之西洋,以商战二字为国,法令更密于牛毛,断无能久之理。然彼自横其征而不禁中国之榷税,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,则犹有怨道焉<sup>⑦</sup>。

此中“商战”乃相对“耕战”而言。《商君书·慎法第二十五》:“民之欲利者,非耕不得,避害者,非战不免。境内之民,莫不先务耕战而得其所乐。”<sup>⑧</sup>“耕战”指耕作(重农)和征战(拓疆),即秦“田开阡陌”、“斩敌赐爵”的施政方略<sup>⑨</sup>。曾国藩引申商鞅“耕战”提出“商战”,系指商务和征战的国策。即时人所谓:“秦西以商贾为国本”<sup>⑩</sup>。这点李璠在19世纪70年代作了透彻的解释。为此,与其说曾国藩的“商战”是口号,毋宁言其较早地提及“商战”。

清政府自被迫开放条约口岸以后,列强凭借海上优势向我输出商品和鸦片。尽管如此,我对外贸易犹持出超。但是,列强利用政治特权和不平等的关税协定,以大量的鸦片冲击我市场,不久便造成贸易呈下降趋势。1864年我国对外贸易仍然出超,至1865年到1871年轮船招商局创办前,急剧逆转。时人痛感国势陵替,利源外溢,在1868年提出“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”<sup>⑪</sup>。这里的“商战”被特定在对外通商的国际关系上。

## 二

任何商战论者的理论阐述,总是要考求“商务得失”和“消长盈虚”的。据此,归根结底商战是半封建半殖民中国早期商业资本思想的体现,无由游离近代商务观念之外而“独树一帜”。返而言之,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,都是一种历史产物,探索商战的源流,分析它的不同形态及其内部联系,不能忽视当时的商务思想。

19世纪60年代的“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”,并未广泛流传。由于海防争议和兴办航运活动,19世纪70年代,时论、官方文书较多地使用“隐分洋商之利”、“以商敌国”以及“寓兵于商”。争议,辨明了事与物的曲直和时与势的趋向,赢得洋务派、改良派或其他派别(即使顽固派也在变)对近代商务以轮船为嚆矢的认识。如19世纪60年代的丁日昌就提出:

“(火轮)无事则任彼经商,有事则归我调遣,若使各口有轮船二三十号,夹板百十号,不惟壮我声势,亦且夺彼利权。”<sup>⑫</sup>又如左宗棠初视轮船为海战利器,用以“防洋缉盗”。尔后他重新估价:船成之后,不妨装载商货,借以捕盗而护商,兼可习劳而集,纾商民之困<sup>⑬</sup>。丁、左所揭示的兵商关系,实际就是郑观应“寓兵于商”的刍议。同样,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的“稍分洋利”,也是针对舶来品充斥市场,白银外流,财源涸竭,以“机器自为制造,轮船、铁路自为转运”<sup>⑭</sup>,抵制和制约商品的流入和外商在华的商务活动。这些认识的改变或提高

不啻有利于我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完善,还为商战思想的产生准备了原始的理论依据。

丁日昌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郑观应均主张造船,发展轮运;扶掖、振兴商务,以商养兵,用兵护商;以外商为争衡对象。所不同者,郑观应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“唯有自理商务,核其出入,以期互相抵兑”,更接近自己总结的商战观念;时间上的差异,丁日昌为最,郑观应为次。姑且勿论商战之源流,就时序言,先者于后者有无发微和启迪,谅必不再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了。

当然,19世纪60、70年代除丁、郑之外,还有其他的商务观,承上说或稍加衍义有之,标新立异、自树一帜也有之,但万变都不离“分洋利”之宗。比如不满“天下日趋于苟”,主张“振兴商务”的朱采<sup>⑨</sup>,就引丁、郑为同调,建议以“五船为一帮”,“或以一帮之中商兵兼用,一以任载,一以备战”,“以八十号轮船纵横江海,揽货图回,以利生利,以息生息。”<sup>⑩</sup>再如薛福成认为:“昔商君之论富强也,以耕战为务;而西人之谋富强也,以工商为先。”<sup>⑪</sup>提出隐分洋商之利,夺洋人之所恃。并且具体设想:“彼此共获之利,则从而分之;中国自有之利,则从而扩之;外商独擅之利,则从而夺之。”<sup>⑫</sup>显然,是分是扩还是夺,其根本点就是通过商务途径与外人争较。薛福成和朱采的商务观念虽未标以“商战”字样,然与同时商战论者所思相通,都要汲汲于争。

### 三

19世纪70年代肯定商战,视商为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当推李璠了<sup>⑬</sup>。他虽是监察御史,却主张“以商敌商”、“以商制敌”<sup>⑭</sup>。他认为洋务兴起数十年,兵衅迭开,上下交困等百变之事咸为“通商”所致。因此,他提出“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,前往贸易”。他说沿海商民皆知此事关系大局,只是骤难联合,国家如能善为联络、隐为体恤,商知有所依赖,必闻风而起,“破敌之谋而暗销兵患”。李璠还提出两个“自行”:外国所需于中国者,自行贩运;中国所需于外国者,自行制造。不过他的“自行”领域没有李鸿章“自为”包括铁路等那样广泛。其所言制造主要指购求机器,学习仿造洋布、呢毡之类日常消费物质。这和1894年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“商务”篇中所说“中国所需于外洋者,皆能自制;外国所需于中国者,皆能运售”,与此说并无多大杆格。

李璠对商战的认识是肤浅的,他只知“古之侵人国也,必费财而后辟土;彼之侵人国也,既辟土而又生财”,而不知其由。又如他鼓励“凑集公司”,发展商务,但却强调官商联为一气;见到“不必提拔公帑”的一面,而不见唯恐官府陵商、剥商,商人资本宁附洋商之尾的另一面。凡此,说明他的商战感性不足,理论自相抵牾,未能提出较多的内容。

郑观应、薛福成、李璠等人的商务、商战观,几乎都以招商局的活动为内容和理论依据。招商局创办伊始确染有争利的色彩<sup>⑮</sup>,时人对其用于争利、商战寄以厚望和持乐观的态度。象陈兰彬估计招商局创办前后的进出“合计三年中少归洋商者约1300万两”,建议扩而竞之,由内江外海以至泰西,逐渐开拓,往彼经商,“隐制洋人之根本”<sup>⑯</sup>。事实上真正商战要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因此,19世纪70年代商战缺乏丰满的内涵,显得偏隅而浅薄,其因主

要是囿限在“原借以分洋人之利”的招商局<sup>②</sup>，没有更多和更广泛的实践活动。

但是，19世纪80年代就不同了，近代化的工矿业兴起，资本主义相应发展，不少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兴亡计，鼓吹洞达洋务，以商力浚利源，要与洋务并驾齐驱，“潜夺其权”<sup>③</sup>。洋务、商力不单是航运和军工，而是包括开矿、制造、造船、铁路、电报等<sup>④</sup>。既然商务观念扩大到生产部门，那末与之有关的商战也非往日之调了。

说“商战从容坐镇而屈人者”的刘铭传<sup>⑤</sup>，不仅是我国铁路的倡言者之一，而且还是19世纪80年代商战思想的充实者。他的商战观首先表现在为“商”正名。他批评礼部尚书奎润等“外洋将商务当着国本，自强在于经商，中国以民生为国本、自强在爱民”的片面说法，指出商者即民，商务即民业，“经商是爱民之实政”，“恒心根于恒产，足食方可足兵，而自强之举首在致富，致富必先经商”。他认为我商务不兴，咎在官商不合。商有难言之隐，而政府于商腴违疏泄，既无保邦惟名之意，又无振兴良策，致商困顿。政府亟应改弦易辙，“讲求商政”。商政者，当自成体系，刘铭传主张举凡丝茶、煤铁、纺织、种植、制造、矿务、航运等都应列入“商政”。政者，正也，需加统辖管理。由政府委派公正大员督理，并与有关商政诸务的殷商富户妥议取益防损的章程，使之行有章法。

刘铭传议论于1889年，我国近代化铸造、开矿、筑建铁路各业，有在创办，有在筹议，处在洋务运动势犹未衰之际，但不少洋务官吏在兴办工商企业中多主官办或官商合办，成了阻碍发展的消极因素。鉴此，刘铭传向统治集团提出“不聚敛于民者，不能不藏于民，不与民争利者，不能不与敌争利”，摆平与协调官商和敌手三者的关系。不容置疑，刘铭传的观念和他在直隶提督、闽台督抚任上的实践确比有些商战论者引经据典泛谈富强要高明。

#### 四

甲午战争以后，清政府兵威顿挫、国威扫地，引起举国各阶层对清廷的不满，他们不但力主变革政治，还要求发展近代经济以抵制外侮。因此，商战交融于政治变革而灌注“以财战不以力战”、“以商战取代兵战”等内容。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当中，除了郑观应、汪康年专门撰写商战与兵战，商战与政治、外务关系著作外，康有为等也间接或直接阐发了“古之灭国以兵，人皆知之；今之灭国以商，人皆忽之。以兵灭人，国亡而民犹存，以商贾灭人，民亡而国随之”<sup>⑥</sup>。“以商为战，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”<sup>⑦</sup>。由此可见，商战已趋系统化和理论化，集中体现资产阶级要摆脱封建羁縻，改变生产关系以及抵制侵略的愿望。

郑观应从“初习商战”时期起就潜心商战的考察，经过数十年的政治、军事和洋务企业活动对商战的概括和总结，在19世纪90年代已形成权威性<sup>⑧</sup>。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”，“兵之并吞祸人易觉，商之掊克敝国无形”以及“形战”、“心战”等等，随着《盛世危言》的流传影响遐尔中外，但商战如何结与国家现状有的放矢，却不逮汪康年、吴桐林所论。

汪康年发表“商战论”相去郑观应的“商战”时间不远<sup>⑨</sup>。该论以强食弱内的观念阐述：国家立于地球之上，咸以战争自存，教以夺其民，兵以夺其地，商以夺其财。而夺财之战，在未通商之前商自为战；通商之后合一国之商与他国之商相战。汪康年说商战与兵战不同，商之为事常，兵之为事暂；兵者备而不必用者，商者无日不用。此说虽与郑观应雷同，但立

足之点却不一。郑观应以商为四维之首，汪康年强调政治因素。他认为商之所利者，不外四端：货物美、资本轻、程途捷、行销广，不惜国家之力，难继为功。如不行激励奖励，不定专利法律，货物不美；政府不设银行，税则不更，借贷之法不变，资本不轻；铁路不筑，轮船不广，程途不能便捷；国家不设公使领事于各国及其通商之埠，就不能以轮船载货之它洲，又不能以兵卫商。此外，汪康年对照中国的现状指出：自与西国交通以来，兵则屡战而不一胜，条约屡订而权利愈失，国权不足；西国之货销行岁亿万计，货财日失，利源日涸，财力不足；商人勤力与西人相搏相持，国家所需者多取之商，而对商不加体卹，致商日蹙，商力短绌。有此“三不足”，商战不行，商务难驾于他国之上。

要克服“三不足”展开商行，汪康年认为首从国家着手：改革币制，不使白银外流；予商自主，设馆立会；改进税则，重进口而轻出口；设领事馆简派公使，使商出洋有所依恃。他还认为切实振兴亦非易事，各事可分轻重缓急，陆续施行。定商政、改税则、铸钱币、设银行、筑铁路变革成法和不易等举的，不必之于今日。而给商权、允设商会考求商务，不致西人抑勒，仿制泰西各物，渐行各国争利；办商报，互通商情等，时时可行，不必久待。

汪康年的“商战论”内容比较多，抑或因其办报的缘故，有点哗众取宠，且有赖上倾向。但因其着眼于政府，所以对政府的批评较多，尤其对官吏侵商，罗列了17条之多，恰与郑观应的“十战”对应，给人的印象：商务弊政不革除，侵商日甚，徒言“十战”。

读了“商战论”，与之“私心吻合”<sup>④</sup>的吴桐林，由于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和沟通南洋侨商关系，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商战思想。他的商战观与汪康年不同，重在务实。汪康年赖上，他主自立；汪康年并列战具有三，他主兵商并行不悖。他说“商务益盛，其国势益强”，欲使中国跻入富强之林，必须放手商民“自立”，各埠华商自行集股构造兵船和大小船只，或购机器仿外洋制造各物，行销中外<sup>⑤</sup>。反之，政府筹措经费，拣派熟悉商务通权达变的人，召集“海外豪杰”，联合“洋面壮士”，展开兵商之战亦可。吴桐林的民力和重商不倚官的商战，完全是吸取卫台反日血战中，政府不图恢宏，不思援救的教训，颇具切肤之感。

## 五

“商战于实业为重要，国家之所以强盛，人民之所以乐利，胥赖于此”<sup>⑥</sup>。

“列强倾向注集商战，经济竞争列于军备”<sup>⑦</sup>。

“士民工商兵皆各尽其心，联合为用，以争胜于学战、农战、工战、商战、兵战之世界”，“商帜一扑，国微无色”<sup>⑧</sup>。

20世纪第一个年代，如上引表明，商战不只是当权阶级、资产阶级的态度，随经济变化和社会需要，关键是用于指导实践。从需要的角度，资产阶级较为迫切，但不排斥对当权阶级的影响，就如“商战”在官书里的出现。自庚子、甲午以还，两次军事实力较量，相形见绌的现实首先迫使少壮官吏岑春煊、端方、载振等承认“西人制胜之本不在兵”、“以商战九万里而制五洲之货与其死命者”<sup>⑨</sup>的事实，见到商战与国家的利害关系。然而，他们所要的商战，更多地是考虑国家利益的部分，如采取建立商部，制定商律，颁布开矿、筑路章程一系列发展工商的辅助措施。而整个商战在这段新政时期，相应前者表现为逾越旧时“商握四民

之纲”、“商之体用在工”，而成为实业思想的一部分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发展。民族资本同外来资本矛盾变得尖锐，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；超于概念化逐渐演义为口号，乃至竞争、图存的象征。这可从吴桐林所办的《商务报》中见到一斑<sup>③</sup>。

20世纪初的商战命意已较“以商为战”、“无形之战”的含混说法进了一步，明确商战“好比两国交兵一样，你要胜我，我要胜你”的竞争性。而且还具有坚韧的精神：“不胜的总要设法求胜，就是胜的也要精益求精，必要立于不败之地”<sup>④</sup>。“精益求精”，无疑是指生产制造部门，包括整个生产到商品的全程等，即当时的工商实业范畴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。

其次，突出商战旨在“筹边”，直言不讳“取人之财，兼能弱人之国，渐渐地夺他的土疆，奴役他的百姓”<sup>⑤</sup>，公然标榜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。固然，郑观应也曾涉及拓土开疆，但其强调“国家不惜巨资，备加保护”，“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”<sup>⑥</sup>，国家政策以商为轴心，置商于受保护的地位。“筹边”此说则不然，讲究商之主动于力争，以及内在的进取性。

其三，郑观应说：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”、“以财战不以力战”、“决胜于商战”，是一味强调商战。而在20世纪初的《商务报》中的商战，既不轻视商战，也不忽视兵战和其他方面的手段。其说外国人“借商务为殖民之计”，“开口便说商战，而暗抱掠夺宗旨”<sup>⑦</sup>。并针对英国专用这个方法，变加拿大、印度、非洲、澳洲为它的属国，又要争占西藏，提出“合力以抵制”<sup>⑧</sup>。所言“合力”当包括各方面的因素和力量，有商有兵，有政治也有外交。

其四，对于商战的进行，郑观应、汪康年洋洋洒洒列了十条八条，面面俱到。但《商务报》所反映的就比较概括，它简洁地归纳为“以开商智为最”，事之成败在智慧利钝，将启藩商智当视为根本大计。提出要有战略的远虑，遍遍开实业学堂，延聘通儒，广招学生，俾得专门肄习。此外，还要在商民中树立利权思想，善于自谋，尽力创造，不要“甘为负贩，代彼运销”<sup>⑨</sup>，充当附庸。实际上这就是吴桐林的自立思想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由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，加速了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，扩大了商品销售、劳动力供应市场，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。但是初步的发展又因帝国主义的压迫、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束缚，复趋停滞。因而在“商战剧烈之顶冲”时期，出现了以中国“小资本家”经营“个人商业”，只能“师法各国”，无能匹敌的悲观论调<sup>⑩</sup>，即商战失败说。

商战失败说，早在19世纪末谭嗣同引外商对厘金批评说：“厘金为咽喉之石灰……得不到呼吸，此商脉之所以绝，商战之所以败北。”<sup>⑪</sup>只是没有象20世纪初谈得那样普遍，分析失败的角度也没有那样广泛。如上海立宪公会孟昭常说国贫民弱导源于商战失败，商战失败因商法不行，商战无方<sup>⑫</sup>。还有的说我国不讲实业，农工诸务均不如人，导致“人胜而我负”<sup>⑬</sup>。也有极端地认为：“中外互市以来，商则有之，战则未也；商与商自为战有之，与外商战则未也。”<sup>⑭</sup>显然商战失败说，在20世纪初或稍后伴随着商战呼声高涨也被提了出来。

纵览近代中国，商战作为与外来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竞争，未对我国的经济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，或者说未能得以实施，本身就无成功可言。究其原因，有政治因素，也有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，但根本还是经济原因。首先，是晚清生产力低下，它既不适应，也不可能产生商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固有的竞争精神。详而言之，商品经济的竞争，必须具备商品的货物与商品流通的市场。就商品论，19世纪我国除了密集型原棉、丝茶自然物品和非熟练劳动

所增的产品,别无他物用作“战具”。况且,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,这些物品供生产者直接消费,在剩余的情况下由产品转化为商品的,其交换也是为了使用价值。至于市场虽有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外来的投资、商品倾向而得以扩大,但被列强控制和垄断的,尽为外人所占;国际市场不可企及。

另则,商战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的交换进行竞争,这种竞争应是以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。19世纪末叶,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向高级阶段的过渡,在资本输出同时向我国和世界市场倾销商品。无疑,两种不同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,不等价的和强制性的贸易,成为强者实行经济扩张,政治控制、掠夺资源攫取垄断高额利润的手段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既无同样的生产方式与之抗衡,又不能抵制外来商品的冲击,无从展开商战。再则说到底,商战所要求的贸易是前资本主义时期、即重商主义所主的保护性贸易,希望通过国家权力,采用关税和财政措施抑制外来的贸易。因此从社会发展观点看,商战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显示;从实际意义上看,以其昔日之新,难为今日之最,有点不入于时。

## 六

商战贯穿着近代社会很长一段时期,涉及开放主义、抵货运动以及重商主义等一系列问题,这里仅就重商主义与商战关系略作阐述。

重商主义产生在欧洲15世纪,兴盛于16、17世纪,它并不是一般的商业资本思想,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,即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工业资本产生以前的思想体系。商业资本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,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,方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的历史前提,同时成为货币资财集中的先决条件。重商主义产生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衔接和交替时期,具有为集聚商业资本要求打破封建割据,统一领土的积极意义和为了资本原始积累从事掠夺扩张的两重性。反映在两个阶级的关系上,即封建阶级与商业资产阶级互相牵制、互相利用。然而,商战思想如上述表明无可分辨地蕴含着重商主义的内容,只是与重商主义因时因地因社会形态不同而表现出外观上的差异。具体地说,商战产生晚于初期重商主义约300年左右;形成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,其时资本主义犹处在稚嫩、初步发展的阶段;商业资本尚未完全发展到足以转化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程度;国家机构也不象欧洲封建政权干预到经济生活。再则,商战和重商主义一样,也存在着初期不完善与后期理论化的区别。因此,其所包含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,就不可能完全与重商主义相同。

说商战思想与重商主义有关系,主要是指商品流通的问题上。当然,与早期重商主义的重金观念似关联不大,纠葛在于后期的贸易差额论,即贸易平衡论上。按托马斯·曼重商观念:国家的财富是生活的必需品,就是土地的自然产品和本国工人劳动产品,而工业产品对国家更有利。意即把生产当作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;财富的直接源泉在流通领域,输出创造财富;在国际贸易流通中少买多卖,造成顺差。至后期的新重商主义者塞卡卢非则又明确要求国家干预,实行护商措施和对外扩张,而完成了重商主义的所有理论。据此,对照前述商战内容,如郑观应之通塞损益说,通过国际贸易获利,“保护商务”,“借官权为操作”,呼吁变更关税协定、改命币制等等。不难看出有许多甚至很重要的地方不啻相似,而且如出

一辙。汪康年、刘铭传、李璠以及我国的重商主义者马建忠、薛福成等亦莫不如是。

总之,商战作为经济思想的范畴,势必因循经济法则而产生、而发展、而完善。

(本文责任编辑:陈鸿琛)

# 注:

- ① 商战直至本世纪的30年代还被沿用,本文所述范畴限于近代社会。
- ② 赵靖: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》,第321页,中华书局1964年版。
- ③ 夏东元:《郑观应传》,第80页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- ④ 《厦门大学学报》,1985年第4期第85页。
- ⑤ 黄清根:“‘商战’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的?”,《新华文摘》,1984年第9期;另见《文汇报》1984年4月6日。
- ⑥ 赵靖: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》,第297页,中华书局1980年修改版。
- ⑦ 曾国藩:“复毛寄云中丞”,《曾文正公全书·书札》,第17卷,第14页。又据同书第28卷第33页云:“泰西诸洋以‘商战’二字为国”。
- ⑧ 《商君书·慎法第二十五》,第79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4年版。
- ⑨ 司马迁: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第68卷,第2238页,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- ⑩ 朱克敏:《雨窗消暑录》,第186页,岳麓书社1983年版。
- ⑪ 牟安世:《洋务运动》,第91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- ⑫ 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:《海防档(丙)机器局(一)》,第4页。
- ⑬ 《李文襄公全集·奏稿》,第18卷,第2、4页。
- ⑭ 《李文忠公全集·奏稿》,第20卷,第20页。
- ⑮ 朱采:“复夏侍郎”、“市林说”,《清芬阁集》第4、2卷,第21、7页。
- ⑯ 朱采:“时务策(1873年)”,同上书,第22卷,第24—25页。
- ⑰⑱ 薛福成:《筹洋刍议·商政》,第25、26页。
- ⑲⑳ “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”,《洋务运动》(一),第167、168页。以下凡引奏折、折片,具不另注。
- ㉑ 刘广京:《英美航运在华的竞争1862—1874年》(Anglo-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—1874)第151页。
- ㉒ “太常寺卿陈兰彬奏稿”,《洋务运动》(六),第10—11页。
- ㉓ “王先谦奏折”,《洋务运动》(一),第197页。
- ㉔ 王韬:“治中”,《弢园文录外编》,第1卷,第23页。
- ㉕ 王韬:“西人渐忌华商”同上书4卷,第2页。
- ㉖ 刘铭传:“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”,《刘壮肃公奏议·谟议略》,第2卷。以下凡引此奏折,具不另注。
- ㉗ 刘铭传:“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”,同上书第2卷,第28页。
- ㉘ 康有为:“上清帝第二书”,《戊戌变法》(二),第145页。
- ㉙ 谭嗣同:“报贝无征”,《谭嗣同全集·思维壹壹台短书》第422页。
- ㉚ 参见拙作“郑观应‘初习商战’时期及其商战思想”,《江海学刊》,1987年第4期。
- ㉛ 汪康年“商战论”,《时务报》,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;《汪穉卿先生遗文》,第14—17页。以下引文出自是篇,具不另注。
- ㉜㉝ “吴桐林致梁启超、汪康年函”,1897年10月28日,《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》(未刊稿)。
- ㉞ “论实业”,《东方杂志》第1卷,第10期。
- ㉟ “商箴”,《华商联合报》,1910年第2期。
- ㊱ “华商联合报序目”,《联合会报》,第1期。
- ㊲ 岑春煊:“山西巡抚岑奏请振兴农工商所折”《政艺通报》,壬寅年,第6期。
- ㊳ 《商务报》由吴桐林创办于1903年,停刊于1906年,前后共约70期,其中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涉及到商战。
- ㊴㊵ “商务教科书演说”,《商务报》,第53、45、45期。
- ㊶ 《盛世危言》。商战(上下)。
- ㊷ “论中国物产”,《商务报》第52期。
- ㊸ “论绅商宜提倡实业尤以农事手工最要”,《商务报》第60期。
- ㊹ “论中国商战失败之原因及挽救之方法”,《江汉日报》,1908年7月。
- ㊺ 《谭嗣同全集》,第121页。
- ㊻ “商法调查案问答”,《预备立宪公报》,1909年6月30日,又见《华商联合报》第15期。
- ㊼ 黄炎培、庞淞:《中国商战失败史·总论》第1页。
- ㊽ 沈恩孚:《中国商战失败史·序》第3页。